

京师史话（5）：一场“仕子云集”的运动会

校史研究室 魏书亮

说起体育运动的项目和竞赛，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，因为，它常常在我们身边举办，也常常就在我们身上发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将时光回溯，定格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的中国，举办一场运动会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。

1905年5月28日，景山东街的和嘉公主府，钟声响起，京师大学堂的举人和贡生们集合，列队走向公主府东面的沙滩。刚刚修好的9000坪大操场，大雨后空气清新，一场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会将在此上演。在“天子脚下”的“首善之区”，这样的活动，由执学界牛耳的京师大学堂来举办，自然应者如云，说其有“开天下学界之风”的影响，今天看来，并不为过。

体育项目作为课程，运动赛事作为集体性的活动，进入学堂，纳入学校教育体系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，尤其是在官僚系统和士人阶层中，是很难想象的。要想实现突破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既需要改革的时机，也需要革新的勇气，需要整个社会酝酿出适宜的舆论和风气。然而，在由科举统领的封建官学系统中，读书治学的内容和科目，根本没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位置，“文弱书生”“饱学之士”“醇儒人格”是理想的读书人形象。尽管也有“武举”选才，但却时兴时废，终科举之世，中国官方意义上的“武学”一直没有建立。学校作为教化之所、社会风气的酝酿中心，其千年之久的“抑武”“唯文”传统，客观上来说，要对国人精神上的疲弱和体魄上的强健不足，担负一定的责任。

在西学东渐和新风熏染的时代潮流中，上述情况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先得风气之先、接触西学较早的上海和天津，一些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已开始有办运动会的创举。依据现有资料，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的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校运动会。1899年天津洋务学堂联合举行的运动会，则是我国最早的校际运动会。当此时，清廷以“维新”为名的自强运动已有基础，不仅新的教育思想可以被吸纳，运动会的形式也容易受到关注而得以提倡。

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，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，同时，在全国尚无专门的主管教育的机构的情况下，也是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。作为最高学府，她代表着学界的风标，新式学堂将其作为马首，唯其是瞻。作为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，教育政令多由此而出，全国学堂则需遵照奉行。1898年，由梁启超起草的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将“体操学”明确列入大学堂的普通学功课，规定每周为2—3学时。1903年，清政府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规定全国所有新式学堂均要开设体操科，内容则分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。体育功课进入课堂，体育活动得以开展，有了制度性的根基和法律性的依据。

基于上述原因，由京师大学堂来举办一场运动会，自然意义非常，影响也大大超过活动本身。让我们依据已有文献和媒体报道复原一下运动会的场景。

清晨的沙滩操场门口，彩花炫目，黄龙旗迎风飘扬，两队巡捕荷枪以待、分列两旁。操场上，经过雨水洗刷的地面，格外的清洁，正中的万国旗高高竖立。

京师大学堂的300余名学生，统一短衫筒服，裤脚束扎，在导行乐队的前引下，鱼贯入场，巡捕们则用举枪的姿态，频繁地向他们致敬。

人数最众的师范科生，在红面蓝底的缎子标旗引领下，身着白操衣走在前面，标旗上的“大学”二字，身上的红色号码，在宽阔的操场上格外耀眼。仕学馆的大旗则是白绸红边，上书“仕学”二字，学生身着土色的运动服，在预备科、译文馆、实业学堂等队伍的白色服系中别具一格。各个年级、科别、项目的运动员们，还要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，执法的裁判、学堂的监督、维持秩序的巡捕、以及负责茶水饮食的杂役，也都靠不同的徽章以示区别。观众手持“龙形旗”，在一旁加油助威。运动口号必不可少，虽然是“皇太后圣寿无疆，皇上圣寿无疆，京师大学堂长久”的陈词老调，但齐声呐喊却颇有气势。

第一个项目是掷槌，相当于今天的扔链球。接下来依次是八百米突竞走、跳远、二百米突竞走。中午则回大学堂用餐，下午，各科学生尽数到达，主要的项目有：掷球、跳高、顶囊竞走、一百米突竞走、提灯竞走、犬牙形竞走、二人三脚竞走、三百米突竞走、四百米突竞走、一脚竞走、掩目拾球竞走。第二天的比赛还有团体的拉绳(拔河)项目。“仕学馆”和“师范馆”的比赛过程，被《大公报》记录下来。“两馆各选12名学生，彼此角力23分钟，互有牵动，未见胜负。教习鸣号而止，在粉板上大书‘能力相等’四字。和事佬裁判总算将这场好戏摆平。”专门为职员和来宾安排的项目，主要为匙蛋竞走和一般性的竞走。

北京、天津乃至河北的不少学堂也有参加，大学堂则为它们安排了竞走比赛，取得名次的学堂有：通艺学堂、顺天中学堂、八旗高等学堂、五城学堂、湘学堂、蜀学堂等等。

1906年、1907年，大学堂连续举办了第二届、第三届运动会。第二届运动会上，“都门各学校乐与观成，连袂偕来，观者如堵。”总监督李家驹自任“会长”，亲力亲为。最后一天的教职员工比赛，只见他脱下袍褂，短衣短裤地站到300码起跑线上，快步如风，第三个冲过终点。那一刻，在洪潮般的喝彩声中，京师大学堂“全员参与”的体育展示，已成街头巷议。运动会到了第三届，规模也颇巨，发展为京畿周围的联合运动会，有资料称参加人数达5000人。



张亨嘉



李家驹

京师大学堂举办运动会的目的,我们可以通过1905年总监督张亨嘉“为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”,以及1906年总监督李家驹“大学堂第二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”来做分析。按照张亨嘉的说法“造就人才之方,必兼德育、体育而后为完备”,由京师大学堂

举办运动大会,“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已。”“本大学堂学生平日课余皆令练习各种体育法,而今日之会则无论其技艺之熟与否,皆得与焉,以无一人不习体育为义例。”李家驹的说法更进一步,明言:学堂之有运动会,“所以励体育而奖武事,为国民教育最重要之一端。”

在京师大学堂的示范和倡导下,不仅京师官立中学堂以上的各学堂,积极参加此三届的运动会,以各省大学堂为中心的区域、校际运动会也逐渐举办开来。体育课的开设,以及体育活动的开展,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,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堂中,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开始遍及。